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ying xiang zhong guo jin dai shi de ming zhu

梁启超

变法通议

罗炳良 主编

liang qi chao bian fa tong yi



华夏出版社



梁启超全集出版工程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1卷



中华书局

近 代 史 的 名 著

变法通议

梁启超 著
何光宇 评注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法通议/梁启超著;何光宇评注.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5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罗炳良主编)

ISBN 7-5080-2760-4

I. 变… II. ①梁… ②何…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
—文集 ②政论—中国—民国 IV. ①B825.91 ②D69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295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本 7.875 印张 138 千字 3 插页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影 响 中 国 近

罗炳良 主编



梁启超

飲冰室文集之一

變法通議

自序

法何以必變。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晝夜變而成日。寒暑變而成歲。大地肇起。流質炎炎。熱鎔冰遷。累變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鳥。飛魚飛蠶。袋獸脊獸。彼生此滅。更迭迭變。而成世界。紫血紅血。流注體內。呼吸吸養。刻刻相續。一日千變。而成生人。藉曰不變。則天地人類。並時而息矣。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貢助之法。變爲租庸調。租庸調變爲兩稅。兩稅變爲一條鞭。井乘之法。變爲府兵。府兵變爲驍騎。驍騎變爲禁軍。學校升造之法。變爲薦辟。薦辟變爲九品中正。九品變爲科目。上下千歲。無時不變。無事不變。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爲也。爲不變之說者。動曰。守古守古。庸詎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萬百千變。今日所曰爲古法而守之者。其於古人之意。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今夫自然之變。天之道也。或變則善。或變則敝。有人道焉。則智者之所審也。語曰。學者上達。不學下達。惟治亦然。委心任運。聽其流變。則日趨於敝。振刷整頓。斟酌通變。則日趨於善。吾揆之於古。一姓受命。勅法立制。數葉以後。其子孫之所奉行。必有以異於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猶徇焉以爲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齟齬守之。因循不察。漸移漸變。百事廢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興者審其敝而變之。斯爲新王矣。苟其子孫達於此義。自審其敝而自變之。斯號中興矣。漢唐中興。斯固然矣。詩曰。周雖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

中華書局《飲冰室合集·變法通議》首頁

总 序

罗炳良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个特定时代都会出现一批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著作，人们习惯于把这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称之为名著。历代名著以其丰富的内涵、睿智的思想和深刻的启示，不但给世人提供了行为龟鉴，而且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进程。惟其如此，关于名著的汇编与刊刻，历代层出不穷，成为我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仅以20世纪为例，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严译名著丛刊”，影响颇大。从50年代开始，商务印书馆又组织翻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无与伦比。90年代末，河北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一套“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国人对于名著的浓厚兴趣和价值认同。21世纪伊始，华夏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丛书，遴选12种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撰写或翻译的学术名著加以评注、整理出版。这不仅是继承前贤事业的总结性工作，而且这项工作本身又将成为学术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谓具有双重的意义。

谈到学术名著，在一般的文献目录书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分类和确切的定义。但是，由于世人长期约定俗成地广泛使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评价标准。我认为，名著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出时代的特征。优秀的学术名著大多能够站在时代潮流之上，揭示当时社会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反映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境界与精神风貌。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考察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就可以看出这些名著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作者的思想动机，发掘出名著蕴涵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从中得到借鉴和启迪。

（一）名著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津梁。关注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评价学术名著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重视学术名著的归宿。研读历代学术名著，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有助于世人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社会历史演变的规律，增强自身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自觉投身于社会历史运动，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活动，为现实社会服务，把人类社会纳入良性发展和理性运转的轨道。

中国古代思想家非常注重考察社会的变迁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揭示学术名著的时代价值。先秦时期的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一统天下的历史被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大国争霸的局面所代替，因而颂扬夏、商、周王朝功业的《诗经》也就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记载诸侯国历史的《春秋》。在孟子看来，《诗经》代表三代王朝兴盛统一的时代，而《春秋》则代表诸侯争霸的分裂割据时代。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名著的产生受时代的激荡，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历史的演变及其特征，直接影响着《诗经》与《春秋》的盛衰兴替；二是人们从名著的盛衰消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历史的演变，区分历史发展阶段，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写《史记》，是一部藏之名山、流韵千古的学术名著。司马谈极为重视时代发展与学术事业的关系，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司马迁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既讲到从春秋末年诸侯割据到汉朝统一的时代变迁，又强调学者应该把这一历史变革及时记载下来，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脉络。司马迁继承父亲的史学意识，以揭示社会历史演变为己任，郑重地说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把自己撰述历史的事业和周公制《礼》《乐》，孔子修《春秋》联系起来，既表现出深邃的历史感，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所以《史记》能够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名著，决非偶然。汉代以后，历代学者认识到名著是居今识古和引古筹今的载体，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名著的社会价值。南朝刘勰撰《文心雕龙·史传篇》，指出：“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意思是说，人类社会的产生，在后世看来乃是非常遥远的事；而人类历史又是一次而过，不具有重复性。后人要想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只能借助于前人的文献记录；一旦离开文献记载，历史的真相也就渺茫难稽。唐朝建立以后，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叶空前统一的强大皇朝。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们时时以隋朝短祚为借鉴，注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李世民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政要·任贤》）。即把前人的行事当作一面镜子，既能看到历史上朝代的兴亡、政权的更替，又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参照，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从亲身经历的政治生涯中认识到史籍的重要性，大力提倡修撰前代史书。他在《修晋书诏》中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纚，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史詮事，历兹未远。发挥

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强调后人居今识古的途径，只有通过史学名著去认识历史过程，深刻地揭橥了史籍作为沟通历史与现实纽带的作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强调：“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以自觉意识著书立说，做天下有用的学问，撰写出《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著。他认识到要想写出名著，就必须戒除治学浮躁、心存侥幸、急功近利等不良作风，必须做扎实的学问，这样的著作才有学术价值，才能对社会发挥作用。

在今天看来，学者居今识古，是为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而引古筹今，则是要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应用到现实社会，古为今用。如果离开历代名著（当然不仅仅限于名著），这两个目标都将无法实现；而恰恰是名著的存在，搭起了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桥梁。

（二）名著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飞跃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翼并进。经过时间长河大浪淘沙洗礼而流传下来的历代名著，无疑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名著中蕴涵着许许多多优秀的东西，而最有价值的是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成一种

崇高的爱国情感，超越了特定的时代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代优秀的学术著作，都能够反映出作者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极为关注的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通过记载社会历史的治乱盛衰、学术思想的得失利弊、人民生活的贫富苦乐，反映出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风貌。这种关心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成为历代学者致力于撰述政论和学术著作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古代学者中，历来存在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感意识。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说明孔子修《春秋》是在礼崩乐坏、世道衰微的社会局面下，具有一种试图拨乱世而反之正的忧患意识。而《春秋》这部名著一经产生，就发挥了让乱臣贼子心存戒惧而不敢犯上作乱的社会作用。到两宋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使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突出。范仲淹正是在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他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卷七）。这种忧国忧民的

意识使《岳阳楼记》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清代龚自珍的忧患意识也很突出，特别强调“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阐明史学名著具有增强世人忧国忧民意识、陶冶爱国主义情操和教育世人关心国家大事的社会价值。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加剧，救亡图存成为学者们忧患意识的主要内涵。魏源撰《海国图志》，明确认识到要抵御外侮，必须学习外国长技，富国强兵。他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原叙》）。这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回答现实社会所提出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环伺中国，边疆事务日渐孔亟。这一时期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逐渐增多，产生出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和姚莹《康輶纪行》等名著。以何秋涛研究边疆问题为例，主要着眼于中俄关系。他认识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英、法、德、美等国有隔海之遥，而沙俄与中国接壤，势必成为最大的威胁。他说：“我朝边境接壤俄罗斯，几及万里。康熙年间设界碑于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诸地，此北徼界碑之始；钦定大臣至尼布楚会议，定约七条，此北徼条例之始；雍正年间，设卡伦于忽伦贝尔及楚库河诸地，此北徼卡伦之始。皆宜详考，以备掌故。”（《朔方备乘·凡例》）。作者以极其深刻的边疆危机忧患

意识考察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目的在于为清廷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依据和借鉴。果然，此书撰成后墨迹未干，沙俄就通过《璦琿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霸占了我国 15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这样惨痛的事实，更加衬托出这部名著的远见卓识和爱国主义思想。进入 20 世纪，名家辈出，名著更加丰富。新历史考证学派史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人，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把爱国主义情节寓含在著述之中。陈垣在日伪占领下的北平拒不与敌人合作，阐扬历史上爱国志士的民族气节，撰《通鉴胡注表微》，成为现代史上的一部名著。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忧患意识与爱国思想更加鲜明。郭沫若在“风雨如晦”之际、“鸡鸣不已”之时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为了民族的出路研究历史。他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他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史稿》，与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撰写的一大批史学著作，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今天我们研读历代名著，可以继承和发扬先辈的

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全社会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传统的教育，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感情沟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统一，使中华民族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三）名著是每一个社会公民增益历史智慧的源泉。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整个社会中每一个公民文化素养的程度。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我一直认为，要培养全社会的人文素质，首先应当重视哲学教育和史学教育。哲学可以培养人从现实的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而史学则可以培养人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因为小自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规划，大到国家施政方针的制订，都不外乎两个依据，一个是以现实社会客观形势发展为依据，另一个则是以历史过程演变为依据。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说社会实践是个人和社会增益现实智慧的源泉，那么历代名著则是个人和社会增益历史智慧的源泉。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认识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绳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就是说，生活在现代的人之所以要认识古人的所作所为，目的是要给自己找到一面镜子，汲取古人的智慧。但是，由于各个时代古人的行事各不

相同，对于历史上人们实行的一些制度和古人的做法，后人又不能像镜子一样完全模仿、照搬。因为古人的各项制度都是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哪怕是最完美的制度，由于时代的不同，也不可能完全适应于后世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形势。所以后人只能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智慧，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好自身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深刻地总结出从名著中汲取历史智慧的方法。他说：“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跻，商、冒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箱篋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乃若《春秋》成而贼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我们从刘知几所谓“世无竹帛”和“竹帛长存”两种情况所造成的不同结局，可以清楚地看到史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后人阅读史籍可以达到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自省的效果，使客观历史通过史学名著而发挥启迪和教育功能，增益人们的历史智慧。第二，汲取历史智慧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